

# 现代日本僧人域外旅行记

葛兆光

## 井上円了的欧美考察

日本善于模仿和学习，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，在隋唐宋元时期日本多次派遣僧人来中国学习。不过，自从十三世纪后期“蒙古袭来”或者叫做“元寇”的事件之后，情况略有变化。尤其是，经历了明清之际“华夷变态”，为了防止切支丹影响而成“锁国时代”，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，当明治维新后日本由“锁国”而重新“开国”，他们的模仿和学习却转了一个身，从东方转向了西方。当然，无论学中国还是学西方，他们都是同样执著，一样热情，一样专注，也一样有成效。

关于明治之后日本佛教向西方学习的问题，我以前为了写《西潮却自东瀛来》一文，曾经花了很多时间，专门看日本佛教徒留学欧美的若干记录。这次为了讨论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之后，中国与日本佛教应对西潮的不同，所以，又仔细看了看著名的井上円了的《欧美各国政教日记》（收入《井上円了的·世界旅行记》，东京：柏书房，2003），这部日记记载明治二十二年（1889）他对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考察。

这一年，他乘船经旧金山横穿美国，又从纽约渡海到达英国，在欧洲考察之后，再经由印度洋回国。

井上円了的（1858-1919）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学者，对中国影响很大，现在东京的东洋大学就是他创立的。当年，蔡元培就翻译过他的“妖怪学”著作，鲁迅和周作人当年也曾对他的“妖怪学”很有兴趣。不过，在这部日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作为一个和政治有密切关系，卷入维新大潮的日本佛教学者，他所关注的问题，其实，倒是一些影响后来日本国家与宗教发展的重要要素。

第一，传统宗教在现代国家中有什么作用？在对西方各国政教考察之后，他下了一个断语说，“国家的根本是精神”，而不是“军力、商业、金钱或学术”。井上认定，现代文明不仅是有形的文明，而且是通过教育塑造的无形的文明，这种无形文明是竞争中淘汰的结果。他以基督教为例，说基督教能够经历变化，仍旧是欧洲普遍信奉的宗教，这是它自身经过十字军东征、新大陆发现、印度洋航海、接触阿拉伯和印度新文化，并且能“新旧相合并酿成文明新元素”（25页）。所以，从这一点出发，他也期待日本佛教能够成为这样的宗教，介入现代国家，成为国家的信仰核心。而这一点，恰恰正是近代中国佛教所缺，却是近代日本佛教着力学的方向。

第二，毕竟他是日本佛教的信仰者。这一立场使他认定，西方文明虽然有用，但不能就这样用在日本，正如美国的共和政体适用于美国，俄国的国教适用于俄国，因而这些制度和宗教，未必适用于日本一样。他相信，社会如同生物，要把外来的东西消化吸收，才能成为自己的原质（27页）。他认为，日本的“皇统体系”（天皇制）国家与“僧统体系”的（本愿寺）佛教，这两者正好就是互相适应的。这一点绝非偶然，他解释说，这是因为日本人重血统，所以，“皇统”与

“僧统”一系，自然成为人民自然拥戴之文化（27页）。

第三，他出访欧美，也刺激了他思考一个日本佛教如何应对世界变化的问题。他认为，一个国家要独立，必须有语言、历史和宗教的独立。日本佛教虽然从外来，但自从弘法大师提倡“神佛调和”论以来，外来信仰与本土资源彼此协调，所以成为日本精神的来源，而其他宗教都不适合日本人民。但是，他也看到，自基督教从欧洲和俄国传来，就对日本宗教作为日本国家的精神支柱产生冲击。所以，他考察世界，正是为了了解远西之国，在巨变时代如何保护自国的宗教（31页）。

第四，欧美的现状也刺激他重新思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。他说，“所有的人必须兼明两件事情，只见其一，则会是偏见。政治家要理解政治上的保守与改革两种主义，哲学家也要了解哲学里面的理论与实践两种派别。”（22页），而政治与宗教之间，有表里两方面的关系，也就是彼此冲突，也彼此依赖。因为尽管西方世界强调政教分离，不允许神圣宗教干预世俗政治，但是，政府既要通过制度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，但也需要通过宗教使得人民安心。

考察了欧美各国之后，井上円了总结了世界政教关系的三种类型：一是有“国教”，政教合一；二是有“公认教”，但政教分离，三是“齐民教”，政教绝不混同。他说，明治日本是第二种，虽然理论上政教分离，但是宗教却在社会上有“公认教”之事实，而在制度上无“公认教”之名义。所以，他始终注意观察西方基督教世界里的各种情况，为日本佛教寻找应对现代世界的策略。

从日记中可以看到，他所注意的，是寺院与人口、宗教的心理疗法、教会何以衰落、教堂如何维持礼拜等传教方式、教会对于英雄的表彰、教会的会议制度等等，甚至连基督教教会的收入分配与教士的收入多少，他都看得十分仔细，并且不断以此与日本佛教对比。比如，他比较了西方基督教与日本佛教的仪式，包括（a）内部的装饰，包括偶像、偶像之光明、神像前的礼坛、花瓶、供奉物品；（b）礼拜的仪式、法衣、珠数、合掌跪坐、焚香诵经、铃与钟；（c）僧侣生活，是否带妻、外出穿着法衣、祭日断肉、寺院寄宿、有男女僧尼、法王、教主统辖教士等等（62-64页）。此外，他也考察了欧美宗教大学的设置、慈善会和布教会的活动，以及西方宗教对于婚姻与丧葬的处理。

考察欧美的时候，他时时想到的是日本。在日记的最后，他说到“哲学馆”的改良，他认为，国家之独立，端赖语言、历史和宗教之研究教育，而大学就是这样的研究和教育机构，目的是（一）大学应当爱护和教育日本固有学问，以文学、历史和宗教学为主，振兴日本之学问，保存日本人心和维护独立精神；（二）大学要分西洋和东洋两部，东洋部分要包括中国与印度，因为日本的部分中有很多是从印度和中国来的，可是要清楚地知道，“经过千余年，这些外来的文物已经形成了日本的性格，外来的元素已经化成一种固有的国风民风，与印度与中国大为不同”（148页）；（三）他提出的理想是“日本主义”，

“一方面维持本国的独立，一方面爱护日本固有的学问”，而东洋部中有关日本固有的学问，即神佛儒三道以及我国固有的文史哲（148页）。这显示了明治日本佛教的人世雄心，但是回头看看中国，在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，大清帝国的佛教徒，却仍然还在睡梦之中，难怪寄禅说，“嘉道而还，禅河渐涸，法幢将摧；咸同之际，鱼山三藏，法海应今起大雷。更向泥巴求古本，神山宗教见新开。”我没有去查书，不知道现在的《康有为全集》中有无此诗，姑记于此（168页）。

顺便记上一笔。此书之《西航日记》（井上円了的明治三十五年环球旅行记录，亦收入《井上円了的·世界旅行记》，东京：柏书房，2003）中记载，河口慧海，也就是写下著名的《西藏三年》的那个日本人，将取道印度进藏，他在印度见到康有为，康有为曾赋诗赠河口慧海：“禅僧曾空寻西藏，白马驮经又再来。阿耨达池三宿住，金刚宝土四年回。异书多半出三藏，法海应今起大雷。更向泥巴求古本，神山宗教见新开。”我没有去查书，不知道现在的《康有为全集》中有无此诗，姑记于此（168页）。

## 释宗演的中国日记

明治维新后，日本人很瞧不起中国人，尤其是甲午一战之后，那种鄙夷心理似乎表现得格外明显，连日本佛教也对中国的佛教很轻蔑，觉得中国一蹶不振。所以，从东本愿寺一系列到中国开教的僧人起，就存了一个用日本佛教反过来拯救中国人的心思，所以，释宗演这本记载他到中国访问的日记《支那巡游记》（收于《释宗演全集》第九卷，东京：平凡社，1929）前面，著名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（猪一郎）写的序文中就公然说，“禹域之文华，至此时糜烂极矣，盖由宗教之衰，民志绥也耳。今（宗演）提斯法，拯四亿之溺俗。”（5页，撰于大正七年1918）

释宗演是日本禅宗的著名僧人，他的学生铃木大拙更是赫赫有名。他到中国来是为了用日本禅宗来拯救中国人吗？这一点暂且不必管它，倒是这部日记中有一些好玩的记载，让我们知道一些民初的学林掌故。

# 笔会

## 东边日出西边雨之二、之四、之六

（国画）

梁明



台湾读者知道川本三郎这位作家，多半因六年前“新经典文化”所出版的《我爱过的那个时代》；当时，我们以为可以改变世界。

1969年，25岁的川本经过前年口试失败后，再接再厉，终于进入《周刊朝日》（后转《朝日杂志》），当上了一名记者。当记者，是他在大学时代看到自由记者从越战现场不断拍摄发表的照片后，唯一的生涯想象。

进入媒体之时，正值全世界青年大造反的六〇年代。在日本，安保斗争、安田讲堂事件、联合赤军事件、三里冢反成田机场事件……接踵而至，东京街头硝烟弥漫，到处是示威游行，到处是路障石头、对峙的学生和警察，川本穿梭街头巷尾，到处采访新闻。三年时间里尽情燃烧青春，更从电影、爵士乐、小剧场里不断汲取养分。

1972年初，他为了“隐匿消息来源”的记者伦理，坚持不肯供出一名杀害“思想犯”请他代为保管的“臂章”证物，最后遭到逮捕，也被杂志社解职，从此成一名自由撰稿人，写评论、随笔、翻译日。

《我爱过的那个时代》写于1988年，乍看不过就是追忆这段心路历程，记者生涯始末。却因为他饱含柔情的眼睛与文笔，透过伤痕累累的青春告白，将那个理想沸腾的年代整个召唤了回来。2011年随着改编电影，中译本问世，仿佛叠印了台湾的八〇年代，触动台湾读者心情，想起多少“革命”往事，乃成为当年极轰动的一本书，到处有人谈论着。——川本三郎就此“登台”！

接着的是2016年的《遇见老东京：94个昭和风情街巷散步》。

此书，仿佛旅游书，无论书名或编排方式，都让人觉得可以按图索骥，亲临现场看一看。但假如你这样做，恐怕要大失所望。原因正如川本自称，此书乃“已逝风景的型录”，所列出的景点，仅存在于过去，原样早已沧桑，都成“昭和回忆”了。

我个人散步的方式有些不同，看着眼前风景的当下，我会想象着背后已经不存在的过往故事……我希望将这些失去的城市风景保留在记忆中。

川本如何描写这些“失去的城市风景”，“不存在的过往故事”？除了身为“江户子”的掌故记忆之外，他还发挥其所专长，从大量电影、文学作品之中，撷取与景点相关的片段，杂糅成文，极其细腻。或许因为这样，若非娴熟“东

京学”，对东京历史变迁有一定理解者，较难进入文本脉络之中；相反的，如果你爱看日本电影，爱读日本小说，即使很少甚至没去过东京，竟也能从书中获得莫大乐趣。

永井荷风以“东京散策”闻名，边走边看边晃荡，老担心随着新时代的到来，许多老风景都将消逝，而为新奇事物所取代。川本三郎这个东京人同样忧虑新旧递嬗，想方设法留住旧的，即使仅仅只是记忆中的昭和东京。有趣的是，他所念念不忘的“旧”，正是永井荷风所不以为然的“新”。新变旧，旧换新，一代接一代，城市不断蜕变，人的温情与敬意却始终存在，东京因此伟大了。

今年，大叔又回来，带着最新的作品《少了你的餐桌》。原文书名“君のない食卓”，此“君”字，想成川本过世的爱妻，文中的亲人朋友，甚至读者本人，都无可。川本似乎特别擅长这种文字游戏，《遇见老东京》，原文书名“いまわかし东京町歩き”的“いま”，同样可视作“现在”，也可解成翻阅阅读的“此刻”，想玩这游戏，得咬文嚼字，得腹有诗书，川本大叔的文字功力，于此小处即可见一斑。

这本书还是在追忆，追忆他生平所吃过的食物。所以不称美食，乃因所讲的几乎都是庶民餐饮，日常食品，没有名厨没有秘方不讲食材作法，更没有吃进去嘴里那一种那一种的感觉描述，大叔绝不扭捏呼喊：“おいしい”——无非就是蛋包饭、纳豆汤、猪肉味噌汤、鳗鱼饭、秋刀鱼、炒饭、便当……有什么好装表情的！？而川本实在也没有要讲饮食之美，他不过借借食物，返身回顾人情之美耳；

年过六十后，不论吃什么都会想起从前。比起往后的时光，过去的岁月显然长得许多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。如今我由衷地认为，食物就是回忆。

是的食物就是回忆！每张餐桌底下都有一段又一段的故事。这当也就是为何我们总觉得远藤周作、波岛正太郎，乃至《深夜食堂》刀疤老板这些位大叔笔下铲上的食物特别吸引人，特别好吃的原因。与其说大叔有练过，见多识广，能言善道，倒不如说大叔用“生命”在看待食物，这当然比小伙子的“生活”美食来得许多。

萝卜本身没有什么味道，却能好好吸收对方的味道，让我们尝到好滋味。川本这样说萝卜，实不无几分大叔自道的意味。大叔，“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”之人。越过了山丘，蓦然走进人生下半场。有一点智慧，有一点沧桑；有一点感慨，有一点花样。更要命的，还有许多矛盾和温柔。他知道列车终点很快就要到了，有时也懊恼年轻的错误，却多半能欣赏青春的挥霍，伤痕累累终究不愿意开口喊痛。

说到底，大叔是萝卜，无论身材或本色。吸收了一辈子的人生味道，让人尝到好滋味！——川本是大叔，用生命写了三本书，你也尝尝！？



# 「吃什么都会想起从前」

川本三郎的三本书

傅月庵

引线的背影，她的背上有一大片汗渍。她会头也不回地对我说：拐角太暗了，你不要抄了，瞎了眼睛。可是，她摆绣花架子的地方也很暗啊，为了交货换钱，她自己都来不及休息。我一直奇怪，她怎么知道我正想歇手呢？

我要去下乡的那一年，临近冬天的时候，母亲把一楼公用厨房的煤炉子拎到了拐角，在这里做饭烧菜，省去了上下楼梯的麻烦——她感到了体力的衰退。

母亲烧的菜在妯娌中被公认是最好的。我印象最深的有红烧带鱼、油煎抱盐带鱼和放了黑木耳、香菇的红烧烤麸。那时带鱼便宜，常买常烧。炉子放在拐角后，我有时便在炉边学两下，几天后就注意到备用的锅盆放在炉边地上太过杂乱，但是可以在右边墙上搭个板架，让它们“升空”。我跟母亲说了想法，她不置可否，可眼神告诉我我是允许的，只是她不相信从没拿过木锯的儿子女会做木工活。

借来了锯子，备好了螺丝刀和榔头，家里正好有四根废弃的凳脚和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——我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这项“工程”，因为父亲下班后看到狼藉一地会厌烦的，他从乡下回城上班了，我得尽量不触动他内心的焦躁。

拐角成了我的“工地”。我在每根凳脚的上端，锯出一个90度直角，下端凿出一个凹口，把凳脚的上端与屋顶搁楼的正方形横梁贴合，敲上钉子固定，把木板插入四根凳脚下



老家的房子拆了。那天，站在一片废墟前，家的轮廓依然映现在脑海里，特别是从二楼到三楼那个两个多平方米的拐角——这幢老房子住了一大家族人。父母婚后就住在二楼的前厢房，父亲的两位兄长住三楼和几个阁楼。三家的孩子加起来有十多个，这个拐角是交通“枢纽”。

小学暑假时，这里还是我和小弟主要的活动天地。那时，父亲是“右派”，去乡下改造。母亲和二姐整天在房间里绣花，补贴家用。下午，朝西的厢房太阳逼人，在绒绣花架前流汗不止的母亲会把我们赶到这个拐角，我们在这里写作业、下军棋，玩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也许是四年级，有一次去后弄堂，看到两个大哥哥在下围棋，觉得有意思。于是跃跃欲试，却轮不到上手，又没钱去买棋子。我与小弟作出了一个决定：自己做。

忘了从哪里讨要了几片一厘米多宽、尺把长的钢锯，又到文具店里买了几块木砂皮，从后弄堂外的木匠摊里赊了一把细长的边角木料。我们带一张红木凳子搬到了拐角作为工作台，手工制作围棋：先把木条锯成一个个一厘米多宽的小方块，再用砂皮把小方块棱角磨成圆形，最后用墨汁将一半的棋子涂黑。三个步骤，却都是细活，整整做了一个暑假。母亲有时在门口看着我们，微笑着，红木凳子被磨磨得伤痕累累也不责怪。这时，如

# 我的拐角

宁白

果有堂兄弟们上下走过，好奇地停留，母亲便会说：以后来和阿明一起下棋。

我们把181枚黑子和180枚白子分别放入两个父亲抽完烟丢弃的圆形烟筒，单调寂寞的一个月，终于被一丝成就感代替，再去画一张棋纸就不当回事了，反而更像是大功告成的一种仪式。

我与小弟开始在拐角摆台对垒，也有堂兄弟或邻居闻讯参加进来。可是，我们的下棋水平始终停留在“叫吃”、“做眼”的程度，一点没有长进。多年后，这副自制的围棋不知缘由地丢失了，让我痛惜不已——年少艰辛中，第一次表达自强的物件，就这样轻易地被抹去了。

我喜欢看书了。好像更喜欢看那些隽永、感情丰满的散文。没有钱买书，就抄书。

还是在假期，还是在那个拐角，只是红木凳子成了书桌，我用黑漆封皮的横线簿一口气抄下了何为的四篇散文：《第二次考试》《两姐妹》《最初的带路人》《石匠》。说不出为什么喜欢何为，大概当初能看到的散文中，他的是最能打动我的。也抄了

巴金、刘白羽、魏钢焰散文的大片段落。记得还有一篇写女化学家侯毓汾教授的报告文学《女教授》也被我全文抄录。从西窗射进来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梧桐树叶照到拐角，已经暗淡了，该时的眼睛真是好啊。

“文革”时我是初一的学生，偷偷看了《居里夫人传》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还有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居里夫人的美丽和对科学的探求精神，使我不仅抄了书的段落，还抄下了她的年谱。另外两本书，看得似懂非懂。但凡是我自认懂了进化逻辑和激励人心的地方，仍然抄了不少。抄这三本书，我单独用了一个本子，把它们抄得更为端正，想着日后可以再看。几十年之后，我从书橱底层翻出这些本子，黑漆封面之间已经粘连在了一起，内页里挤挤挨挨的字体仍能看出当时的认真，抄的内容却不再看了。少年时的懂与不懂，都化解在了生命的旅途中，有的成了养分，有的随风飘逝了。

暑假最热的那几天，母亲会把草席当窗帘挡住火辣的太阳。我抄得想歇手的时候，抬头就会看到母亲穿针